



岁月留痕

——上海图书馆历史记忆

上海图书馆 编著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Literature Press

岁月留痕

——上海图书馆历史记忆

上海图书馆 编著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iteratur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岁月留痕——上海图书馆历史记忆 / 上海图书馆编著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5.1
ISBN 978-7-5439-6414-3

I. ①岁… II. ①上… III. ①上海图书馆-图书馆史
IV. ①G259.27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58455号

责任编辑：徐 静

岁月留痕——上海图书馆历史记忆
上海图书馆 编著

出版发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地 址：上海市长乐路746号

邮政编码：200040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20 X 1000 1/16

印 张：16

字 数：269000

版 次：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39-6414-3

定 价：48.00元

<http://www.sstlp.com>

前言

岁月如梭，一晃，上海图书馆已经走过了一个甲子，在这六十年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经历了许多变革和发展，其中既有四馆合并时的初创回顾，也有馆所合并后图情发展的后续记忆。

岁月确实可以留痕，本书邀请了上海图书馆 29 位资深业务专家，其中有年逾花甲，甚至已步入耄耋之年的老前辈，也有在职的业务干部，他们以真挚的情感投入，用口述的方式，客观真实地反映了我馆每个时期的各项业务，因此可以说，他们是上海图书馆馆史内容的亲历者，也是上海图书馆馆史的见证人。本书共有 37 个主题，按业务板块分类，分别为馆史、馆藏特色、业务建设及特色服务，这些板块基本涵盖了上海图书馆业务的方方面面，系统地记录了上海图书馆自 1952 年建馆以来的点点滴滴。

这些珍贵的历史回顾，汇成了上海图书馆六十年来业务宝典。本书收录了 1952 年上海图书馆开馆时的第一任馆长李芳馥先生以及 1958 年上海图书馆和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上海市科学技术图书馆、上海市报刊图书馆四馆合并后首任馆长顾廷龙先生的工作轨迹。馆藏特色部分讲述了中外古籍珍本，无论在数量上和珍贵程度上，在国内外都是数一数二的，同时还重点记述了上海图书馆历年来编制的《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全国报刊索引》等享誉海内外的书目。从另一方面看，本书图文并茂，形象生动，其中既有口述者的简历，也有与之相关的历史图文资料，十分具有可读性。

本书脉络清晰，史料真实，不仅使上海图书馆的历史档案得以较为完整地保存，也可以让更多的读书人走近上海图书馆，并对它的史料有更为全面的了解。

上海图书馆馆长
2014 年 7 月

目 录

馆 史

回忆李芳馥	李名世	1
回忆顾廷龙	吴 织	9
回忆潘景郑	吴 织	17
筹建上图回顾	孙秉良	21
四馆合并	钱培生	27
农村、市区网及全国第二中心馆	艾 冲	33
市区图书馆协作网	吴建中	42
新馆建设	何大镛	48
新馆现代化建设	缪其浩	57
新馆组织文化建设	王世伟	65
图情联手,馆所合并	马远良	70
名人字画收集	陈燮君	76
接待党和国家领导人	王鹤鸣	87
接待国际友人	马远良	93

馆藏特色

藏书楼珍本文献	祝均宙	99
《上海图书馆西文珍本书目》	孙继林	109
典藏家谱	王鹤鸣	114
盛宣怀档案	冯金牛	118
馆藏视听珍本文献	徐德芬	131
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	萧斌如	135

业务建设及特色服务

《中国丛书综录》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任光亮	147
《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	李 文	153
《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	萧斌如	157
《全国报刊索引》	李 文	163
中文图书集中编目	曹汉新	167
读者服务工作与年展	周德明	171
参考咨询服务	周玉琴	183
专递与简报	陈 超	192
上海—旧金山友谊图书馆	卢调文	197
珍本复制	艾 冲	203
古籍修复	赵嘉福	205
上海图书馆展览发展历程	杨泰伟	209
上海图书馆讲座发展历程	赵景国	216
高级专家咨询委员会	浦保蓓	222
上海图书馆中专	浦保蓓	226
图书流动车	浦保蓓	232
上海图书馆综合服务部	朱 南	236

回忆李芳馥

—— 李名世

我的父亲李芳馥先生是上海图书馆第一任馆长，至今已离开我们十六年了。他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我的祖父是教书的，非常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来能有出息，在1923年就把我父亲送到武汉，就读于武汉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那时候图书馆专业在中国是非常少的，当年，武汉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是国内唯一的一所图书馆专科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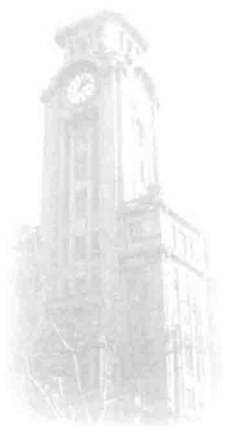
我父亲在那里学习了三年，1927年毕业，被分配到北平图书馆，也就是现在的国家图书馆，从事编目工作。由于他在工作上的努力和勤奋付出，他担任了中文编目组的组长。1934年他获得美国洛开基金会的图书馆研究资金。洛开基金会，也就是美国人拿一部分原来的庚子赔款作为经费，让中国的学者到美国学习他们图书馆的先进经验。他被派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习。

这个机会很难得，他也非常珍惜。当时一起去的还有江苏省图书馆馆长汪长炳，也是他的同学。通过一年的努力，他就拿到了硕士学位，本来他还要准备博士论文，但当时北平图书馆要求他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实习，因此他就放弃了写博士论文。当时他们做的决定都不会考虑个人，全是根据国家的需要。他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实习了一年，后来就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从事图书采编工作。临行前我的姨父，即以后成为著名古籍版本专家的赵万里先生赠与他“乘风破浪”四字相勉。

在他学习期间，美国对教育还是很重视的，从



李名世 男 1943年9月出生，上海电视大学毕业，1982—2003年在上海图书馆工作，馆员，复制部副主任。历任复制工厂部副主任兼工厂党支部副书记、图情公司复制部副主任、缩微室负责人、图情公司总经理助理。





1935年到1939年，让他们到欧洲各国，比如英国、法国、荷兰这些国家的图书馆参观，以增加他们的阅历，所以他很珍惜这个机会。通过这些经历，对他以后在图书馆工作方面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由于国际形势变化，1938年以后日本侵略中国，1941年上海沦陷。根据国内形势，北平图书馆就让他回国了，他在美国工作实习的过程总共7年。他为什么能在图书馆学有很深的造诣，实际上在这7年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1年他回国了，当时中国的留学生也都非常爱国的，只要祖国有需要，他们马上就回来，根本没有想过在国外待下去。国外的条件总比旧中国的条件好多了，但是他们是没有这个意念的，都是要回国的，因为是祖国派去学习的。他们是中国人，是在这片土地上长大的，所以他们还是要把学到的本领回报自己的祖国。

1941年他回到北平。北平图书馆把他派到上海，当时上海有一个办事处，就让他负责这个办事处工作。由于1941年到1945年是抗战时期，日本人的侵略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灾难，所以他的办事处在1941年以后就没有办法开了，只能关掉了。一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这个办事处才得以恢复，他被任命为北平图书馆驻上海图书馆办事处的主任。他有空的时候就跟我们讲他这一段经历，怎么样从武汉文华读书，一直到从事图书馆工作。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陈毅市长非常关心上海的文化事业。听我父亲讲，陈老总自己就非常有学问，他对上海的文化是非常重视的，当时上海成立了文物管理委员会，由李亚农任主任，徐森玉先生当副主任，在这下面成立了图书

整理处和文物整理处。我父亲担任了图书整理处的主任。根据文管会的要求，要尽快建立新的上海图书馆，而且尽量争取早日开馆。因为上海是中西方文化交流最主要的阵地。

我父亲感到担子很重，但也非常兴奋，他很高兴能够把自己学到的东西为新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做贡献。当时我父亲就做了这么几件事情：一个就是召集他原来的那些老同事，如韩静华，就把她从苏州学院调了过来。



1972年李芳葭于上海图书馆旧馆址（时年70岁）

另外在上海招了 200 名具有高中以上学历的青年,其中 100 名分配到上海图书馆,例如后来担任过上海图书馆副馆长的孙秉良同志。那时候上海的高中毕业生素质是非常高的。我父亲还积极地把散落在各地的书整理起来。

他们一起搜集到 20 多万册,包括很多宋元明清的古籍,这也成为上海图书馆藏书的基础。当时很多书因为没有地方安放,就装箱打包,他们暂时把这些东西全部运到虎丘路。图书馆到底选址在什么地方,他们给文管会的李亚农汇报,由李再汇报到陈毅那里。文管会的秘书跟他们一起在上海各个地方选馆址,看看什么地方做上海图书馆比较好。他们找了很多地方,最后选中了南京西路 325 号,原上海跑马厅。

看中这个地方要请示陈毅,听说跑马厅的英国人走了以后,只留了少数中国籍的职员住在这里。陈毅是很有魄力的,当时就拍板同意把这个地方给上海图书馆和上海博物馆。

上海图书馆就在这个地方有了自己的新馆址。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插曲。跑马厅都是有看台的,原来国家体委主任贺龙跟陈毅的关系非常好,贺龙讲:“你陈毅有了这一块儿,是不是另一块儿要给我了。”之后体育宫为什么会在那里,这实际上是陈毅和贺龙之间达成的协议。

那时候刚解放,大家对共产党很热爱,感觉自己当家做了主人,所以在自己的岗位上都非常卖力,夜以继日地工作,进展还是比较快的。他们从各个地方收集了过去遗留下来的各方面书籍资料,另外一方面市政府也拨款买了很多新书。通过他们一年多的努力,上海图书馆终于在 1952 年 7 月 22 日正式开馆了。

开馆那天是非常热闹的,上面钟楼都挂了很大的横幅,因为这是自己的图书馆,又是那么宏伟的建筑,所以很多市民、学生、工人都等着开馆的这一天。《华东画报》出了专版介绍了上海图书馆开馆的盛况。我父亲一直把这个画报保存起来。他过世以后,现在上海博物馆的馆长陈燮君原



20 世纪 80 年代李芳馥与吴建中

来是上海图书馆副馆长，他要写这方面的一本书，需要资料，我就把华东画报赠送给了陈馆长。

当时图书馆主要是为广大工农兵、学生服务的，我读小学的时候也到过图书馆几次，那时候阅览室都挂着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的画像，有五六个阅览室，有科技阅览室、普通阅览室、报刊阅览室、古籍阅览室等等。据我父亲讲，开馆第一天就有 1000 多位读者来到图书馆，把阅览室挤得水泄不通。那时候放茶水的地方都是搪瓷的，供应水都来不及。

他是非常兴奋的，通过自己辛苦地付出，新图书馆开放了，有这么多读者来看书，他感觉自己选修图书馆学还是选对了，而且能把自己学到的东西统统贡献给新中国，把学到的知识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

1959 年建国 10 周年国庆，他专门在《文汇报》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建馆 10 周年上海图书馆的心声，这些老知识分子都有强烈的热爱新中国、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当家做主人的感觉。

我父亲给我影响最深的还有这么几件事情：他告诉我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要撤退到台湾，当时他们想把国家图书馆的这些宋元明清非常珍贵的古籍版本，大概有 8000 多件委托给上海图书馆保存。要解放了，国民党要逃到台湾，他

们想把这些东西带走，我父亲和王育伊知道之后就坚决抵制，感觉这是我们宝贵的文化财富，坚决不同意运到台湾。

由于他们的努力，这些珍贵的 8000 多件宋元明清的古籍没有被运走。后来解放之后，国家文物局局长到上海对这些东西验收，再全部运回北京。我父亲也出了一份力量，保护了这些珍贵的文物，没有让它同其他的珍贵资料运到台湾，这些珍贵的古籍都在国家图书馆被很好地保存了。郑振铎本身就是文物专家，非常关心此事，所以很及时地到上海来验收，验收之后就这些东西带到北京了。



20 世纪 90 年代王鹤鸣等看望李芳馥

我父亲在这个事情上感到很自豪的，在保护国家珍贵的古籍方面也出了一份力，原来他是在北京图书馆工作的，所以对这方面情况也比较熟。1952年由市文管会主任李亚农亲自任命他担任上海图书馆第一任馆长，1953年担任副馆长，我父亲主要是搞业务的，从1953年开始他主要负责图书馆的采编工作，因为他长期在美国图书馆学习，所以能把西方先进的图书馆理念带回来，他对图书采购有很深的造诣。

当时我们国家处于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帝国主义都封锁我们，所以我们外汇非常紧张，国外的书都要通过外汇买的，他为了用好每一笔外汇，在选书方面非常认真，而且他对国外这些出版商的情况非常了解。在国内图书馆有这方面经验的人不是很多，所以他选的这些书都是非常能结合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包括国外一些好的理念，使得尽量不要重复，所以他看出版目录都是非常仔细的。

现在看来，特别是之后长期从事采编工作的人，他们一致公认上海图书馆外文采购系统在全国是品质最高的，在国内都是领先的。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对上海图书馆采购的外文书籍也给予很高的评价。我父亲学的是文献采购，所以在这方面他是有一定的贡献的。

我父亲非常注意学习，不断地更新知识。在20世纪50年代他的英语和法语都是很不错的。刚刚解放的时候，苏联是老大哥，要学俄文了。他每天听广播，一三五上新课，二四六复习，再怎么忙学习从来不会停的，在这方面我觉得我的学习精力还不如我父亲，他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你要为读者服务，要为社会做贡献，本身你要有知识。没有知识，你用什么给大家服务呢？

他非常怀念上海图书馆，1952年他当馆长的时候已经50岁了，70岁的时候他感觉自己老了，所以特别挑了在秋季的时候跑到人民公园留了一张照片纪念，他感觉自己一辈子在图书馆工作，所以要在图书馆拍个照。这个照片我一直保存到现在，我感觉这是一个老知识分子对图书馆事业的热爱，看了这个照片也是很感动的。我是1982年进的图书馆，但是比起他们差距很大了，这些老知识分子是非常热爱图书馆事业的。

他90岁高龄的时候已经有计算机了，都已经在学校、工作岗位开始使用了，他也想学新的东西，就跟原来的副馆长提出来想到上海交通大学看一看，因为当时上海图书馆界的编目上海交通大学是走在前面的。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的馆长就介绍了计算机统一编目，比手工编目误差率更小，而且更快，他感到很



高兴。所以从这点来看，他对新知识是很愿意接受的，并不因为自己一辈子搞图书馆的而不需要学的。就像当时学俄文的时候，当时苏联的出版物是非常多的，所以他也要懂点俄文，以后计算机进入到新时代，他也要了解这方面的东西。他也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我们的学习条件比他好多了，但是并不一定有他那样的精神。

我父亲虽然是在旧社会成长起来的一个老知识分子，但是他对新中国无比地热爱，从20世纪50年代他就开始听党课了。尽管我们国家经过很多运动，他对国家的热爱，对党的信念，始终没有变。他在国外待了七年，他还是热爱自己的国家，始终要靠拢组织，直到粉碎“四人帮”，1985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候《文化艺术报》还专门登了一篇文章。

85岁高龄入党这是很令人敬佩的，我自己也入党30多年了，但是相比我的父亲还是有差距，因为他在国外也待过，到现在为止对我们也还有教育意义的。我们国家通过改革开放，取得了飞跃成绩，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足，毕竟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家，这是你的根。有时候看到他85岁还加入共产党，还有信念，感觉老知识分子的爱国精神是很值得我们铭记的。作为中国人应该感到自豪，我感觉只有共产党能把国家团结起来，才能使得多数人走向富裕，尽管现在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总的来比还是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李芳馥九十华诞暨从事图书馆工作六十五周年纪念会

他对培养人才也是非常关心的。当时改革开放了，知识分子重新得到重视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主任聘我父亲为华东师范大学的教授，他也带了四个学生，其中包括现在的吴建中馆长。那时候带学生条件都是很差的，是在我家里上课的。我家原来住在太仓路，石库门房子，他带了四个研究生，吴建中学的是图书采编。当时改革开放就感觉到知识的重要性，其中一个研究生还在美国图书馆工作，吴建中现在是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馆所长。我感觉他很关心图书馆事业，还要培养接班人。

我的父亲将自己毕生精力献给了他热爱的中国图书馆事业。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图书馆，1995年，因为已经高龄了，所以就住进华东医院。当时上海图书馆新馆也已经造好了，也圆了他的梦。尽管那时他生病了，他站在窗台边从华东医院也能看到上海图书馆宏伟典雅的建筑，他感觉很欣慰，说明国家在发展，他也盼了很多年，上海图书馆书籍越来越多了，读者也越来越多了，原来那个地方根本容不下了，所以一定要造新馆，这也是他们一辈子从事图书馆工作的老同志的心愿。

1996年12月20号新馆开馆他也非常激动。因为他身体不好长期住院，就站在华东医院的窗台看新馆的开放，也是很激动的，感觉自己在有生之年还能看到宏伟典雅的新馆在淮海路竖立起来，感觉他选图书馆学没有选错。

我父亲一辈子学的图书馆学，做的也是图书馆事业，把自己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图书馆，当今中国图书馆在世界上也是名列前茅的，特别是上海图书馆已经列入世界十大图书馆之列。我父亲在有生之年是感到非常欣慰的，虽然他已经离开我们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还是很值得我们回忆的。

我是1982年进入图书馆的，也工作了20年，感觉图书馆是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文化事业的标志，也是四化建设的重要阵地，从他身上也让我学到不少东西。

我父亲虽然在图书馆为国家做了一些贡献，但是我感觉在我们国家对一个老知识分子在工作、生活上也是非常关心的。比如我们原来住的石库门房子楼梯很不好走，他70多岁了还住在那里面，当时领导对他也很关心，在很困难的条件下对他的房子做了调整，在医疗方面也给予他比较好的医疗条件。我感觉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对老知识分子还是非常关心、非常爱护的，也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

我现在尽管退休了，但回忆起我父亲对图书馆做的贡献，我觉得我后面



20 多年在图书馆的工作是很荣幸的，现在怎么样把他的精神继承下去。今天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兴旺发达，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我们要热爱自己的国家，每一位从事图书馆工作者，要热爱自己的工作岗位，努力踏实工作，一心一意做好为读者服务。踏踏实实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祝中国图书馆事业走向更美好的明天。

回忆顾廷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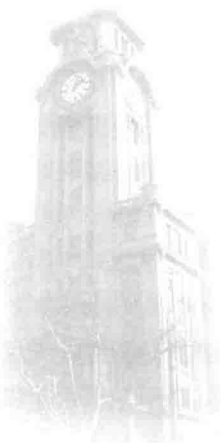
—— 吴 织

我是脱下军装从部队转业到上海市人民图书馆，后四馆合并到了上海图书馆，顾馆长是从原合众图书馆（解放后为历史文献图书馆），再并为上海图书馆担任馆长，主管上海图书馆古籍部门的业务。当时四馆合并提出一个问题，在图书馆专业中有很多是属于专业职能的，像古籍的鉴别、整理、流通、研究，这方面人才比较少。当时我进入了善本组，善本组只有三位老先生，一位是顾廷龙馆长，一位是潘景郑先生，一位是瞿凤起先生。三位老先生再带了刚进办公室不久的我，当时我是而立之年，30岁出头，还有一个小青年，18岁的沈津同志。善本组办公室是一般的工作人员和外人严禁进入的，因为我们办公室和书库是连在一起的。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开始跟随三位老先生学习、工作，一直就在古籍部门工作到1989年退休。那时候上海图书馆古籍善本，在上海图书馆界，或者国内图书馆界，都是一大特色。因为我们收集的古籍，特别是珍贵的善本、古籍善本以及近代文献的重要文物资料，仅次于国家图书馆。

据我回忆，依1981年我们上报国家文物局的数量，我们图书馆馆藏的国家一级藏品中：革命文献和重要期刊就有353种，古籍善本有518种，外文书资料有613种。这仅仅是一级藏品，还有数量更大的二级藏品、三级藏品，还有其他普通的线装书和重要期刊、外文资料。这些馆藏集中收藏不是轻易的四个图书馆合并而来，而是在合并以后有很多热心人士捐献，我们的前辈，主要是顾廷龙馆长，他很专注地收集、抢救当



吴 织 女 1930年12月出生，北京大学毕业，1957—1989年在上海图书馆工作，副研究馆员，特藏部主任。师从顾廷龙馆长，主要从事古籍整理、分编等专业工作。历任特藏部组长、主任、上海市文管会文物图书出口鉴定委员会委员。





顾廷龙在善本书库进行学术研究

时将成为废纸的材料：比如，在造纸厂将要造纸浆堆里面的东西；一些将要被废弃、销毁的珍贵的书刊，也有到古籍书店、到私人藏书家里面选一些珍贵的文物图书资料，那时候收集不是那么容易的，大家对这个藏书也各有所见。

上海图书馆合并以后，

在上海南京西路的原来老馆的地点，我们善本书原来在三楼，因为备战的需要，全部搬到夹层书库，比较安全一点，但夹层书库条件比较差，窗户很少、通风条件不好，在书库旁边设了一个办公室，夏天很热，冬天很冷。就这样的条件下，顾馆长他不在舒适的馆长办公室办公，而是跟我们一起在那个书库旁边的办公室工作。

我记得他在1995年因病离开上海，在北京休养的时候，给我来了一封信。他说：“我虽然没有坐馆长办公室签发文件，但是做了一点实事，你最清楚，就是和馆里面老、中、青三代人一起工作，这样培养学习是收实效，比在学校里上课效果更好。”确实我们也是深深地感受到，尤其是我，每天上班面对顾老、潘老、瞿老三位老先生，有什么问题当场就跟你解答，特别是碰到一些古籍版本鉴别的问题，他们都详细地跟你解答。通过长期的工作实践，我们古籍组的很多同志都觉得顾老虽是馆长，但他没有馆长的架子，给人感觉很亲切，大家很尊敬他，他很谦虚，有问必答，非常有耐心。馆藏有大量的图书破损急待修复，为了保护文物资料，又成立了修补组，把修补组的青年和我们古籍组的一些同志放在一起学习，教我们古汉语。古汉语讲课的老师就是这三位老先生，我记得当时学的课本就是《中华活叶文选》、《岳阳楼记》之类的，逐字逐句地讲，还教我们写字，边写字边抄卡片，同时鉴别版本，这样每天在工作中学习，边干边学。

顾老对培养中青年是非常认真的，特别是我们馆藏很丰富，如果没有一批工作人员很好地保管，整理研究，给读者提供有效的资料，那就是我们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所以他很希望我们能够尽快地把这些知识学到手。我记得那时候，崇明农场来了一批年轻人，我们组也分到了好几位，当时中午大家吃饭以后有一段休息时间，

他对年龄最小的周秋芳讲：“你不要去玩，也不要打瞌睡（因为大家中午都打个瞌睡休息一下），你拿本《文字蒙求》来，我一个字一个字地给你讲。”还有星期天（当时没有双休日，一个星期休息一天），他叫我和沈津到原来的历史文献图书馆去，说你们星期天放弃半天休息，我来给你们讲一些有关善本的古籍方面的知识。星期天上午，我们都到那个地方去，所以顾老跟我们相处了几十年，我们从心里面认为，他是馆长又是老师，又像我们的父亲。从做学问、谈阅历，到做人，对我们的教育是非常深远的。

他经常讲的一句话是：“基础差，不怕，不要怕多少深、多少难，勤能补拙，你只要勤快，能够进步。”还有几句是“俭以养廉，要节俭自己才能廉洁”。在我的脑海里顾老是一个很好的老师，也像父亲一样亲切，关心我们的成长。当时的条件比较简陋，各方面条件比较差，但是很多文化方面的海外人士只要到了上海，就想到上海图书馆看一看，当时上海图书馆在南京西路，是很热闹的商业中心，他们想看看上海图书馆到底什么样，为什么呢？因为十年动乱，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国外都在说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烧书”摧残文化。1977年一年当中就接待了几十批次外国友人来参观，当时领导特别批准他们参观我们的善本书库，把我们一些珍贵的书给他们看，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证明我们不仅把文化保存了，还保存得很好。我记得当时“日本全国图书馆职员友好之翼访华团”依次来了109个人，分五批参观了我们的书库。还有英国、意大利、墨西哥、委内瑞拉，还有伊朗共产党书记到我们这来看我们的古书。记得有一次，是联合国的工作人员，中间有一个女士叫翻译给我讲，她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在台湾（地区），他们说共产党把古书都烧光了，现在看到你们保护得很好。”我们就这样用事实来证明我们是保存传统文化，不是毁坏文化。



1985年11月与顾老

1977年的5月份，美国人来参观，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说日本帝国主义当时侵华没有把这些古书烧光，还保留了这么多，他觉得很奇怪；另外他还问，你们馆收藏最早的书是什么纸张？为什么能保留这么久没有破损，这些问题我们都一一作了详细的答复。我们最早的是公元518年的《维摩诘经》。至今还保存得很好，这些工作都是在顾老的指导下进行的。